

傅斯年与东北史研究

焦润明 邹海英

[内容摘要] 傅斯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在“九一八”国难后,开始转向东北史研究,向国人介绍东北人文历史,树立收复失地的信念,形成全民族的抗日共识。其研究通过翔实的史料论证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驳斥了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观点,揭露了日本为达到独占东北目的而杜撰一系列谬论的险恶用心。其研究不仅大大深化了东北史相关问题,而且还推动了东北史研究的系统化和理论化。

[关键词] 傅斯年 东北史研究 日本 九一八事变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5241 (2014) 06 - 0011 - 08

学术界普遍认为傅斯年是“史料学派”,即科学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实他还是一位经世致用的历史学家。当日本侵占东北期间,他开始转向东北史的研究,运用历史学为捍卫国家主权服务。傅斯年对东北史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主要为1932年10月出版的《东北史纲》(卷一)一书和1931年春天所写的《夷夏东西说》一文。此外,他还发表了多篇与东北有关的文章,如《“九一八”一年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北方人民与国难》、《中国人是整个的》、《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战后建都问题》等,表达了他对中国东北历史研究的相应观点。本文围绕其相关论述,考察他在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对东北史研究的贡献。

一、傅斯年研究东北史的动机

傅斯年认为“‘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大的国难”。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被日本侵占,遂引发了国人的抗日热潮,推动了当时进步知识界对于所谓东北问题的关心,这是他研究东北史的直接动因。“民国二十年(1931),孟真(傅斯年)在北平,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同时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北平图书

馆开了个会……他慷慨陈词,提出了一个问题:‘书生何以救国?’大家讨论的结果之一,是编一部中国通史;此后北大历史系即以这一事业为己任。”当时列入写作计划的《东北史纲》便是他们实施书生救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傅斯年、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等当时著名史学专家都积极参加了这部著作的撰写。同时,傅斯年还与丁文江、胡适、蒋廷黻等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并成为他们鼓吹抗日的阵地。显然,傅斯年研究东北史是在当时的救亡氛围下展开的,并且在他的周围还聚集了一批同道。其研究动机具体体现如下:

(一)通过东北史研究,向国人介绍东北人文历史,树立收复失地的信念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及张学良的错误判断,竟使日本侵略者在四个月内席卷东北大部分地区,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中国民众期盼着国民政府能够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以收回对东北的主权。但是,民众看到的却是国民政府的消极抵抗,将希望放在一个“维持国际公理”的国际联盟身上。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最初采取观望态度,仅仅要求中日双方撤兵,以求东亚的和平。

[作者简介] 焦润明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辽宁 沈阳 110036

邹海英 绵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讲师 四川 绵阳 621000

后来,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国际联盟组织了李顿调查团解决东北问题。从1932年1月调查团成立,到10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出来,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日本侵略东三省,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夫东省事件,本无待调查,所有事实,世界周知,法理曲直,尤为显见”。而且,国际联盟调查团的调查只能起到一种辅助作用,真正在本质上起作用的仍旧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与收复失地的决心与行动。国联调查的结果是日本的侵略行为依旧继续,如此情形激起了爱国学者傅斯年的义愤,使他认识到研究东北史的重要性。他说:“今东寇更肆虐于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御敌,世界观瞻为之一变。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误解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诸?此吾等写此编之第一动机也。”^⑥决心通过编写东北历史著作,向国人介绍东北的人文历史,牢记历史,树立收复失地的信念。

(二)驳斥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从史实及理论上否定日本侵略东北的理论基础

这也是傅斯年在《东北史纲》“引言”中提出的第二个研究动机。他说:“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即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的动机之一,就是要用历史事实批驳日本侵略者鼓吹的“东北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

1. 日本对东北历史研究的谬论

日本对于东北的研究开始于明治维新之前,但只限于元清两朝。“早在明治维新前,主张日本为中心向外侵略扩张的佐藤信渊就开始别有用心地将原是满族的称呼‘满洲’篡改为中国东北的地域称呼,此后还把中国东北与内蒙古东部拼在一起叫‘满蒙’,与朝鲜拼在一起叫‘满鲜’,甚至把中国东北的汉族叫‘外来的殖民者’。”至日俄战争期间研究中国东北史的代表人物有那珂通世、内腾湖次郎、百鸟库吉等。日本的“东洋史学”在中日甲

午战争后开始萌发并发展起来,百鸟库吉是东洋史学的开拓者,继承他的学风而形成的百鸟史学对日本东洋史学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他代表人物有内藤湖南、箭内互、松井、稻叶岩吉、池内宏等。当时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者内藤湖南于1914年发表了《支那论》一书,说,“中国应放弃中国周边的领土,仅保有中国本部就够了”。他所指的中国本部是中国的十八个省,而不包括东北等地。从1908年1月到1937年,百鸟等人对满洲和朝鲜进行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二册、《朝鲜历史地理》二册,《满鲜地理历史报告》十五册,“日本以上至下,六十年来为吞并中国,策划不懈,多方努力”,大体形成了日本学者对东北及朝鲜的研究观点。

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术界宣扬东北不是中国领土的言论更是猖獗,代表人物是日本帝国大学矢野仁一教授。他早年就写了《清朝史》、《近代蒙古史研究》、《最近支那外交史》,后在《朝日新闻》、《外交时报》、《太阳》上发表过《支那无国论》、《满蒙藏非支那本土论》、《满蒙非支那本来领土》、《历史上满洲的支那主权无根据论》、《日本在满蒙的正当地位》、《中国非国论》、《中国的国家及社会》等文章,其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中国不仅是没有国境,因没有国境的结果,也可以说就是不成为国家”,“云水缥缈地带的边疆的满洲、蒙古、西域是假的国境,不是真的国境,也可以说就是不成为中国的领土”,“中国非放弃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地域,则不能达成为国民国家和民族革命”。矢野仁一的“中国非国论”和“满蒙非中国领土论”对日本侵华分子发动战争具有很大影响。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他所谓的《田中奏折》中对矢野仁一大加赞扬:“这所谓满蒙,历史上既不是中国领土,也不是中国特别区域。我国矢野博士努力于中国历史研究,认为满洲绝非中国领土,业经帝国大学公表于世。我国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极其正当。中国学者对帝国大学的立论,无可反论者。”^⑦更有许多日本学者认为,地理上的“支那”指中国本土,并不包括长城外的满洲、蒙古等地。^⑧此时的日本东洋知识界,已经形成了这一理论的团体,在战前就大肆宣扬不符合历史史实的谬论,在一定程度上为具有帝国主义思想和侵略思想的分子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其侵略行径辩护。

2. 日本侵占东北前的舆论造势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了侵占东北,并且使占领合法化,也大造舆论,宣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军国主义分子、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石原莞尔,1927年在陆军大学的讲义稿《现在和将来的日本国防》中说:“满蒙并非汉族之领土,其关系反倒与我国密切……总之,早晚必须领有,这是肯定的。”^⑬而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他制定的《占领满洲计划》中说:“从历史等观察,满蒙与其说属于汉族,毋宁说应属于日本民族。”^⑭与此同时,日本政友会头目、“满蒙积极政策”的推行者、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在公开演讲中也鼓吹:“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洲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族的领土。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的十八个省。本土的汉族对满蒙地方历来都是不关心的。”^⑮总之,为了使东北的领土脱离中国,并且披上合法化的外衣,日本的部分学者和军国主义分子费尽心机,为他们的侵略寻找理论根据,尽管是些难以经得起历史事实检验的谬论。

1932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这是一个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其在《满洲国建国宣言》中宣称“想我满蒙各地属在边陲,开国绵远,征诸往籍分并可稽”。但是,“乃自辛亥革命,共和国成立以来,东省军阀乘中原变乱之机,攫取政权,据三省为己有,猊猊相继,意将二十年。”^⑯意在说明他们建立伪满洲国并拥有对“东三省的所有权”是合法的。

东北三省属中国领土,这在国际上也是共识。甚至连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中也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从事实上批驳了日本学术界的种种谬论。不过,日本关于“满蒙”的种种说法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却一直以来都为中国人及中国学者所忽视,这是一种历史责任及危机感的缺失。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中国国民及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因此,系统地反驳日本谬论,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共识。傅斯年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需要更详细地向国人及世界人民阐述东北的情况。他写作《东北史纲》一书,即是从历史史实方面驳斥日本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论。傅斯年说:“北起朔漠,南至琼崖、交趾,西起流沙,东至鸡林、玄

菟,这是天然赐给我们中华民族的家园。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统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⑰无论是从地理上还是民族上,傅斯年都向我们展示了东北与中国的统一与同一性。用历史事实系统论述东北地区的归属,成为傅斯年研究东北史的宗旨之一。

(三)形成民族共识,振奋民族精神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的创伤,使中国人民面临一个严重的国难。在民族精神需要振奋的时候,傅斯年告诉国人“中国人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耐劳苦的民族,能够在半生存状态中进化。同时,他还举例“上海之抗日,真是‘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犹如东北的义勇军,以那样的情势,做那样超人的奋斗”,以此来鼓舞中国民众。此外,“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思想也贯穿于他的意识中。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分裂只是其中的小插曲”,“有时不幸,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分裂了,或裂于外族,或裂于自身。在这时候,人民感觉无限痛苦,所渴望者,只是天下一统。未统一时,梦想一统;既一统时,庆幸一统;一统受迫害时,便表示无限的愤慨。文人如此,老百姓亦复如此。居心不如此者,便是社会上之捣乱分子,视之为败类,名之曰寇贼,有力则正之以典刑,无力则加之以消极的抵抗。”^⑱他还分析了中华民族的四个特性:“中国民族者,不以侵略人为是,而亦不甘侵略之民族也”,“中国民族者,虽亦偶为人灭其国,却用不能为人灭其民族意识,纵经数百年,一旦得环境之迁易,必起而解脱羁绊也”,“中国民族者,永不忘其失地者也”,“中国民族,虽有时以政治紊乱故,顿呈虚弱之象,然一旦政治有方,领导得人,可由极弱变为极强”。这些对民族特性的论述,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中国人、一名中国历史学者的爱国之心,有利于增强民族的自尊心与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再次灿烂提供了历史依据。

“大一统观念与维护国家独立的民族情结”、“群体观念和以天下为心的情怀”是他民族思想的灵魂。傅斯年说:“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⑲为救亡图存,傅斯年承担了史学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参与《东北史纲》编撰的蒋廷黻也表达了作为学者的这种爱

国情怀与学术救国思想,“正是小鬼不自量力,代司杀之天公以自伤其身耳。反正疯狗咬混蛋,是无不可的。我们一旦被咬得不混沌了,然后是中华民族的复兴。”^②对于日本的嚣张气焰,在傅斯年看来,反抗日本侵略必须是全民族有组织的抵抗,不仅有战场上的战斗,更应有学术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战斗。学术救国、学术报国的思想不仅体现在《东北史纲》的撰写者身上,还体现在《独立评论》正式创刊上。胡适说:“在这个最严重的国难时期,我们只能用笔墨报国。”如徐中舒著写的《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等,以铁的事实有力证明了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管辖,从与明朝的关系等不同角度研究了满族的先世史,彻底地攻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谬论。

二、傅斯年东北史研究的主要观点

傅斯年东北史研究的主要观点集中在由他所撰著的《东北史纲》第一卷^③及其他论文之中。

(一)提出东北自古既属中国说

傅斯年反驳了日本御用学者和军国主义者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观点。在《东北史纲》中,他通过研究东北历史,得出结论:东三省自古既是属于中国。他说:“东北之为中国,其意义正如日月经天者尔。”^④并且就历史而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之郡县,白山黑水久为中国之藩封。永乐奠定东北,直括今俄领东海滨阿穆尔省,满洲本大明之臣仆,原在职贡之域,亦即属国之人。就此二几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或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⑤通过对东北史的研究得出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结论。

傅斯年不仅提出“东北自古中国论”,还强调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应该称为“东北”而非“满洲”,纠正了一直以来日本对此区域的错误称谓。主张用“建州”代替“满洲”的地名称谓,并就“满洲”一词进行了考证。“渤海之建州为一地名,历辽金元而未改。明永乐之设建州卫,实沿千年之旧习俗,并非创制。建州之称既远在先代满洲之称尚不闻于努尔哈赤时,两字若为一词,只能满洲为建州之讹音,决不能建州为满洲之误字。”^⑥通过对《满洲源流考》等史书的考证,他认为“满洲一词,谓为建州一词旨亥豕鲁鱼可也”。指出“满洲”本非地

名,又非政治区域名,乃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别有用心者所造之名词。“此名词之通行,本凭借侵略中国以造‘势力范围’之风气而起,其‘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⑦明确指出,日本学术界用“满洲”一词来指代东北,企图通过用这种地名称谓来为它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论”提供理论根据,是别有用心。

(二)通过种族、民族、语言、习俗文化等方面阐述历史上东北与中原的关系

傅斯年在著述中,用了大量的篇幅阐述了东北与中国北部在远古为同一种族。他运用考古学方面的材料,来说明“吾等今已确知虽在混用新石器时代,东北区域在人种及文化上已与北中国为一体”。引用美国学者安特生的考古结论:河南仰韶所发现的贝环,在奉天(今辽宁)沙锅屯穴居中“惊人的常遇到”,而且在奉天穴居下层中发现的带彩陶器残片,与“河南遗址所发见用具系统中最可注意的一事也”。正是这两点,安特生得出奉天穴居与河南遗留不仅时代上大致相同,而且属于统一的民族与文化的部类。安特生的研究结论也证明沙锅屯居民与仰韶居民及北部中国人为一类。傅斯年不仅使用美国学者的结论,而且引用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滨田耕作教授关于旅顺貔子窝的考古发现。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清也谦次教授认为“石器时代之貔子窝人,谓为与近代支那人之祖先为一事,实最可通之说也”^⑧。这些结论被傅斯年作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远古时期东北地区与中原在人种及文化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

在古代时期,东北地区还有众多的部族,如燕以前的肃慎、挹娄、女真;西汉魏晋时期的夫余、挹娄(肃慎)、高句丽、东沃沮、北沃沮、秽、三韩,傅斯年对这些民族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也进行了考证。在女真强大之前,秽貊为东北重要民族。“秽貊虽自高丽灭后失政治之独立(在朝鲜半岛者除外),其遗民固为东北新族之大成分,新族之文化易于进展者亦以此也”。通过这点傅斯年认为“秽貊与汉族之关系尤切”。傅斯年又以女真为例,女真源自挹娄人,而挹娄人和秽貊夫余人“异语异文而同人形”,而秽貊夫余又和中国为近,由此可以断定虽然女真语言与汉族不同,可是“其种族之大同,或混合之深切”。由此,可以断定东北民族与汉族的

渊源绵长。

傅斯年又通过诸史中的《东夷传》来考证东夷部落在生活习俗方面与中原的关系,认为:“诸史东夷传所载之习俗,如居栅寨而不游牧,饲豕,箕坐,妇贞,三年丧,以弓矢为最要战具,巫俗等,皆与中国人生活有基本的共同。”^②据他推断,在汉语形成之先,“当有一共同之民族或种族,为黄河下半淮水济水辽水洧水各流域或更至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流域之后代居民,安置一个基础的因素,故考人类者,见东北与关内人种之共同,治比较民俗者,见其下层文化之相关,虽后来因黄河流域文明迈进之故,在东北者一时追不上,若文质异途者,究不过上层差别,故易于因政治之力量而混同也”^③。

傅斯年还从语言学方面入手,对东北与中原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在《古代之东北》第二章讲述燕、秦、汉三个朝代东北与中原的关系时,他运用了最重要材料《方言》,从语言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对于《方言》的作者不能论定,但“惟其为西汉之材料(或更在前),则以其区域之名称言之,可以无疑”。他将《方言》中“北燕朝鲜洌水之间”的语句共二十五条抄录,并放在每条之上,用以说明这是“音变”而非“语异”。根据此书,傅斯年认为“北燕朝鲜为一方言区域,西与燕小别,南与齐魏各殊,而此一区中之方言,试与其他区中者比之,皆汉语之音变,并非异族名词之借用。其近于中国之性质,远在本书中所谓‘南楚’者之上”,并据此断定“辽东辽西及朝鲜诸郡久为燕秦汉代之中国人所居,故共成一个中国语之方言区”^④。通过《方言》的论证,增强了东北与中原关系密切的证明力度。

在考证东北与中原关系的同时,傅斯年强调汉族在古代东北中处于主体的地位。这里,他把汉族称为“中国人”。他说“所谓中国人者,指自燕齐一带而往原以汉语为母语之民族而言”,而且此民族由于文化上的优势即政治上的巨大组织,“东向拓置,自荒古已然”。汉族是东北地区的主体民族,是这个地区的统治者。因此,日本人所说的“古代东北及朝鲜为通古斯人所居者,实毫无凭据之论也”。在论证汉族与东北的关系问题上,傅斯年在他未完成的著作《中国民族革命史稿》^⑤一书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第一章《界说与断限》中,“孟真先生认为中华民族虽在名词上有汉、满、蒙、回、藏等族,但事实上实为一族。满清的祖先,乃明

代的土司,汉化本已甚深。努尔哈赤造反之初,建州部的女真人不过数万,在他们的队伍中,汉人和高丽人,恐怕超过半数。满洲的若干姓氏,最初都是汉姓,后来才强行泯除汉字的痕迹。”^⑥傅斯年从民族的角度论证了汉族与满族的关系,关系之密切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融合而来的,这也说明了汉族与东北关系之不容置疑。所以日本所鼓吹的“满州是满族的发源地,所以满蒙是满族的领土,不是中国的领土”是没有依据的。

除了论证汉族与满族的关系,傅斯年在《东北史纲》一书中,还多处指出了东北地区的汉化问题。其实,从红山文化开始,中国东北“汉文化圈”就开始形成,到汉武帝开拓边郡,“汉文化作为一种主体文化向东北亚腹地 and 边域的广泛深入传布”^⑦。从汉武帝建乐浪带方四郡到光武中兴,这数百年间,东北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范围内。在此期间,“史书不记辽事,以太平故无事可记也。此时,汉化在此旧疆新郡上植其最深之根业”^⑧。到东晋建国后,北部地域为五胡所占据。“五胡之中,有汉化极深者,有汉化颇浅者”。以慕容廆为例,他的曾祖汉化的程度不如匈奴刘渊。然而慕容廆及其子孙三世,“雅慕华丰,故建国东北,颇有文物,初服晋朝,亦进臣节,非石氏郝连氏之比也”^⑨。从文化的角度看,东北已经融入了中原文化的躯体之中,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提出商代源于东北说

傅斯年于1933年发表的《夷夏东西说》中,明确提出了“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的说法。为此,他提出《诗经·商颂》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商颂中所谓‘玄鸟’及‘有娥’之本事,在于宗祖以卵生而创业。后代神话与此说属于同源而分化者,全在东北民族及淮夷”^⑩,进而认为夫余、高句丽以及满族有关祖先卵生神话都与商有关。“然则商颂中此一神话,与上文所举后来东北各部族中之神话,明明白白是一件事,至少是一个来源。持此以证商代来自东北,固为不足,持此以证商代之来源与东北有密切关系,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触与混合,乃是颇充足,很显然的。”^⑪此外他还用大量商代的史料或《史记》资料证明,商代起源于东北。他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试为‘景员维河’之国家设想,最近之海为渤海,最近可能之海外为辽

东半岛或朝鲜西北境。相土为商代最早之先王,在有契之后,汤之前,并在王恒王亥之前。以如此早之一代,竟能戡定海外,则其根据地必去渤海不远。纣殁后,殷人以亡国之余,犹得凭箕子以保朝鲜,朝鲜如不早在其统治之内,甚难以亡国余烬,远建海邦。然则箕子之东,只是退保辽水之外,‘从先王居’而已,犹之金亡后犹在混同江边保其女真族,元亡后犹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③

同样在《东北史纲》中,傅斯年列举了中国东北历代各部落的“人降论”——朱蒙天女神话传说。通过对史料《论衡·吉验篇》、《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好太王碑、《三国史记·高句丽纪》、《朝鲜实录·本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分析,傅斯年认为这个神话在东北各族中普遍流传。他不仅得出“东北各部族同源异流”的结论,而且这一神话不以东北地区为限制,在殷商也有同样的神话。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首先对殷墟卜辞中“妣乙”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妣乙”在商王的先祖先妣乙系统中的两个特点,一是“妣乙是永不合祭者”,二是妣乙的祭礼和其他的妣不一样,由此推断出“妣乙必为一特尊之古妣,然后可以与帝喾相土王亥为一类”。认为“‘妣乙’即是传说中之燕燕,即是商之始祖妣即是有娥氏女,更无可疑也”^④。而这个假设,又得到《吕氏春秋》和《说文》的明确证明。在《说文》中,“乙”为“玄鸟”。并且,在《诗经·商颂》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通过比较,证明了朱蒙天女和玄鸟生商为一个神话。进而,傅斯年认为“此一线索,真明白指示吾人,商之始业,与秦汉以来之东北部落导于一源,至少亦是文化之深切接触与混合也。东北部族与中国历史之为一事,由此证据,可谓得一大路也。”^⑤也就是说,东北和商所在的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且源远流长。

傅斯年不仅提出了商与东北的关系,而且引出了商的起源在东北这一问题。除此神话传说之外,对于商的起源,傅斯年还提出了另外两个论证:毫之地望及朝鲜与箕子的故事。对于毫的所在地,傅斯年认为“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暨于济水入海处。汤之先世,溯济水而上,至于商丘”。且《诗经·商颂》中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傅斯年分析到“其海外当即渤海之东,是汤之先祖已据东北为大国矣”。既然汤的祖先已经在商建国前就已占据东北,那么商的起源自然应该在东北地域。

“至于朝鲜和箕子的故事,实不啻指示吾人曰,商与东北本有一种密切的关系,故于丧败之后,尤能退保辽东,而周公成王征东夷之兵力终不及也。不然,以丧败之余烬,焉能越辽海而王朝朝鲜?必其原有根基,然后可据地理的辽远形势以自保也。以此二事,可知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为中国信史之第一章,亦即为东北史之第一叶。”^⑥明确提出了商起源于东北说。

(四) 强调燕秦在东北的政治势力强化了当地与中原的文化同一化

傅斯年考证了最难考证的真番郡来说明东北与中原的关系。在《东北史纲》第三章中,通过利用《〈史记〉自述》、《史记·朝鲜传》、《史记·货殖传》、《汉书·朝鲜传》、《史记·集解》等史料中关于真番郡的记载,考证了真番郡的地理位置,认为“连带证明一事,即燕秦东向已据朝鲜半岛沿黄海之一大部是也”,因此到汉武帝在此划为四郡,“非创造之举,乃承前之再创也”。在《东北史纲》第四章的“族类分析”中,傅斯年指出从箕子东封到燕秦于辽东辽西置郡县,“是则当纪元前三世纪之光景,中国势力已拓置于朝鲜西半部(朝鲜半岛之西南角除外)”^⑦。这说明,在汉武帝前,燕秦的政治势力已达到东北地区及朝鲜部分地区,使东北与中原一直保有政治上的隶属关系。

对于傅斯年的这个结论,邵循正评价“此实为中国在东北政治势力之首章信史”。其后,在《东北史纲》第五章中,傅斯年指出“燕秦拓土……辽东辽西皆置郡县,在燕人卫满带领数万人东渡代箕子建国后,秽貊真番沃沮皆服属,故收集之中国人尤多”。到汉武帝统一之后,“辽外诸郡遂为固定之建制,而夫余句骊秽貊皆服属焉”。在燕秦时,东北已有中原汉族的政治机构,而且也有部族臣服,即此时的东北对中原是一种“服事观”,到汉武帝时为“郡县制”。这些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及领域,都应该属于中华政权及中华疆域内的。

三、对傅斯年东北史研究的评价

傅斯年研究东北史,是在日本悍然占领了全东北后,国民政府希望借助于国联调解收回东北无望,最后的结果是日本的侵略行为依旧继续,“在如此严重的国难之下,统治中国者自身竟弄不出一个办法来”的背景下^⑧,出于爱国义愤,遂从事

于东北问题的研究。决心以学术为武器,担起为国请命、呼号呐喊的责任。今天我们从学术角度看,傅斯年及其同道的东北史研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学者“满蒙非支那”论,从历史的和文化上否定了日本侵占东北的合法性

对于东北的丢失,傅斯年痛心疾首。对于“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言论,他认为更是捏造虚假的史实。他通过《独立评论》将自己所知道的历史史实告诉国人,使国人对东北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他说:“所谓东北者,在历史上本非一个单纯的层次,狭义的辽东永是中国人居住地,其北部则多是荒地,最近百年中山东河北的健儿冒风雪,辟草莱,吃人类吃不了的苦,然后此地民族上永为中国人。一朝日本人来,自然要对这些人加以排挤,然而三千万人岂能赶得许多?”^{④③}中国东北的若干万里疆土是这些不畏艰辛劳苦的中国人民开辟的,始终是中国的领土。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即便占领了这个地方,向世人鼓吹“满蒙非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并以教育进行同化,然而“日本人可以攫取而不能驱走,日本人虽能得其大利,而势不能夺其小利,则他们之存在依然,若以教育同化,则现有台湾之榜样在,试问台湾多数人民之汉人近于日本人乎,近于福建人乎?燕云十六州沦于北奴者数百年,黄河流域各省沦于金元者数百年,一旦大明朝起来,这些地方是谁的呢?”^{④④}从他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既是目前日本侵略者在地理疆域上处于中国的领土范围内,但是东北范围内的民众依旧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且他们的心理所向乃是整个中华民族而非日本侵略者。“今日中国民族之有东北,乃是山东河北劳苦农民的功劳”,所以,任何人对东北的企图都不会得逞。他的这些言论,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思想和文化战线上的抗日行动,有利于凝聚全民族的抗战力量。

(二)开拓了现代中国东北学的研究

我国对东北史地的研究起源于清道光咸丰之间,源于俄、英、法对于边疆侵略造成的危机。日、俄两国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野心,激发了国人对东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如曹廷杰的《东三省舆图说》、《东北边防纪要》、《西伯利亚偏纪要》,后又有刘瑞麟、孙凤翔和赵崇荫辑《东三省交涉辑要》(1910)、吴廷燮《东三省沿革表》(1911)、徐世昌《东三省政

略》(1911)等。但傅斯年的《东北史纲》(193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开拓创新,“能全部包举,为有系统之研究者,仅有东北史纲一书”^{④⑤},是“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开山之作”^{④⑥},奠定了他那个时代对东北古史研究的一个高地,其贡献是无可非议的。傅斯年研究东北史的另一功绩,是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集体从事于学术研究。《东北史纲》作为一套书,虽然当时没能全部出齐,但是受共同的信念和志向所驱使,参加者都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坚持进行研究。参加《东北史纲》编撰的蒋廷黻就曾说:“二十五年以前……因为我深感东北问题的重要,所以在我的研究工作中,东北占主要位置。”^{④⑦}他先后写作了《东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约》(1932年7月)、《外交史及外交史资料》(1932年10月)、《最近三百年来东北外患史》(1932年12月)、《东北问题的新史料》(1933年)、《民国初年之中日关系》(1933年9月)等文章和书籍,丰富了东北史的研究。方壮猷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如《室韦考》、《契丹民族考》、《靺鞨起源考》、《鲜卑语言考》、《匈奴王号考》、《东湖民族考》(译著)等;徐中舒著写的《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等,这些成果不仅从历史上明确了东北的历史归属,还把东北史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尽管《东北史纲》问世后,受到了邵循正、缪凤林等学者批评,认为《东北史纲》一卷,“大抵仅依据正史中与东北有关之东夷传。(其地理志部分,则付诸余逊君)故他记传中有关东北史事之重要史料,大都缺如。而又好生曲解,好发议论。遂至无往而不表现其缺缪。”^{④⑧}对此,傅斯年的学生陈槃辩护道:“东北事变,大举震荡,孟真师忧心如焚,百忙中而有《东北史纲》之作。”^{④⑨}这种解释应该是合理的。傅斯年在国家民族遇到危难的关键时刻,选择了写作史书来反对日本御用学者的谬论和表达对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不满。在他对东北史史料掌握和研究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毅然写作《东北史纲》,体现了他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思想。他以学者特有的“学术报国”的方式来维护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傅斯年的这份功绩是不可抹煞的。对于缪凤林等学者对《东北史纲》的批评,傅斯年“颇思重加修订,终未如愿”^⑤。尽管《东北史纲》这部书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在思想史层面上却是非常有价值的。此书中的某些章节被译成英、法、俄等

国文字递交国联李顿调查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维护国家主权,定性日本的侵略行径起到了巨大作用。

[注 释]

他在叙中说:“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二十年春写的。”见《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第三册,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86页。

⑫⑬⑭ 傅斯年:《“九一八”一年了》,《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⑮⑯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3页,第129-130页,第34页。

本书“告白”明确指出,“(一)《古代之东北》(傅斯年), (二)《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 (三)《明清之东北》(徐中舒), (四)《清代东北之管制及移民》(萧一山), (五)《东北之外交》(蒋廷黻)。”见傅斯年《东北史纲》,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委员会,1932年,“告白”。

《国联调查团离开沈阳》,《大公报》,1932年5月3日,第二版。

⑰⑱⑲⑳㉑ 傅斯年:《东北史纲》,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委员会,1932年,“卷首”。

辛培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理论”与当代右翼歪曲历史的谬论之剖析》,《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42页。

《东北问题六十年总决算?》,《大公报》1932年8月2日,第二版。

⑳ [日]李明:《日本知识人“中国论”的检证》,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编《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67页,第168页。

㉑ [日]柴山兼四郎:《满蒙不是支那本来的领土》,《外交时报》第668号(日本,1932年10月1日),第204-211页;[日]矢野仁一:《支那对满洲的主权论没有历史根据》,《外交时报》第669号,1932年10月15日,第54-69页。

㉒ [日]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东京:原书房,1977年,第426-429页。

㉓ [日]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东京:原书房,1967年,第40-41页。

㉔ [日]栗屋宪郎:《文献昭和史》2,第67-68页,转引

自辛培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理论”与当代右翼歪曲历史的谬论之剖析》,《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43页。

㉕ 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一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㉖⑳ 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第181号,1935年12月15日。

㉗ 傅斯年:《日寇与热河平津》,《独立评论》第13号,1932年8月14日。

㉘ 《东北史纲》第一卷共分为五章:《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燕秦汉与东北》、《两汉魏晋之东北郡县》、《两汉魏晋之东北属部》、《汉晋间东北制之大事》。此卷中,傅斯年主要论述了隋以前的东北民族分布及迁徙演变的过程、区域及地理关系等。他将种族、民族加以地理的因素,将文化与疆域联系起来,把具体的史实讲述出来,并且将这些史实联系在一起,从而得出东北与中国的关系,为中华民族的完整性与民族工程的复建在现代做出了贡献。

㉙㉚㉛㉜㉝㉞㉟ 傅斯年:《东北史纲》,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委员会,1932年,第8页,第14页,第14页,第31页,第127页,第133页,第22页,第23-24页,第24页。

㊱ 《中华民族革命史稿》为傅斯年未完成的著作,它大致是1938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的一段时间内在昆明写成的。

㊲ 张碧波:《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中),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页。

㊳㊴㊵ 《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第三册,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88页,第89页,第99页。

㊶ 傅斯年:《东北史纲》,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委员会,1932年,第110页。

㊷ 金毓黻:《东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36年,第3页。

㊸ 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页。

㊹ 吴相湘著:《蒋廷黻学以致用》,《民国百人传》(一),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61页。

㊺ 缪凤林:《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9月4日,第十一版。

责任编辑:刘 毅